

施家順 著

兩廣事變之研究

復文圖書出版社 印行

施家順 著

兩廣事變之研究

復文圖書出版社
印行

兩廣事變之研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施家順

出版者：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泉州街5號

總經銷：高雄復文書局

連絡處：高雄市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5267

郵撥：0045658～1號

彰化復文書局

地址：彰化市進德路11號

電話：(047) 244103

郵撥：0225988～7號

特價：150元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八〇四號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初版

傳真：07-2264697

ISBN 957-555-096-X

自序

兩廣事變是民國廿五年六月間，因粵桂兩省以籲請中央「出兵北上抗日」而起。兩廣事變前有閩變，後有西安事變，而它居其中，自應有其歷史的定位與意義。然而在一般中國現代史的記述中，鮮有記載，或著墨不多、或語焉不詳，誠爲一憾事。

政治衝突性的事，由於敵對雙方的立場互異，見解迥然不同，實難予以持平之論斷。「爭論性」的史事，或因政治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有所偏廢。致使該段歷史留白；或略而不詳，兩廣事變即是一例，且尤爲顯著。台灣對兩廣事變鮮有記述，連當事者，陳濟棠自傳稿也略而不提。香港、大陸或有幾篇文章，均爲片斷記載，未能有一專門論著。推究其原因，史料之闕如爲其主因。然欲從事此題目研究者之心結，也是一個重要的障礙。

余深信歷史在於求真，不論它是好是壞、是善是惡，均應還它一個真實的原貌。故多年來留心研讀當時的報刊，以及盡力蒐集相關的論文、資料。有系統地將此一事變加以整理、研判。希望經由兩廣事變的研究，了解它在中國現代史上有何意義，提供國人對政爭的省思。

歷史之功能，貴乎知古鑑今。昔日之政治人物多已凋零。然政治人物年年輩出歷史的傳承必須

延綿下去。余不敏，希望藉著本書的刊行，喚起國人深切體認，政治是互動的、短暫的，歷史是互古的、永恒的。

本書之撰寫過程，筆者雖已戮力以赴。惟因多年來，由於教學研究與教育行政兩忙；草成後，未敢付梓發表。迨一九九一年暑期，前往上海復旦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做個人學術訪問，並收集有關資料。承復旦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黃美真教授、中山大學東南亞所所長張映秋教授、歷史系張克謨教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沙東迅教授、廣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黃勛拔教授等人之協助指導。以及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長張玉法教授、政治大學李雲漢教授、中興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黃秀政教授之指導匡正，復承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吳文星教授之二度修改與潤飾，而成斯文。作者由衷感激，藉此特申謝忱。

惟余學識淺薄，伏案草成，或不成篇。疏漏舛誤之處，在所難免，尚祈學者先進不吝指正。

施 家 順 識於屏東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

兩廣事變之研究

目錄

自序	一
緒論	一
第一章 事變之遠因	五
第一節 廣州國民政府與中央之抗衡	五
第二節 兩廣對中央政策的態度	九
第三節 中央對兩廣疏離之隱忍	一三
第二章 事變之近因	二一
第一節 聯合抗日意識之高漲	二二

第二節	兩廣軍事領袖之自恃	二六
-----	-----------	----

第三節	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	三四
-----	-----------	----

第三章	事變之經過	四七
-----	-------	----

第一節	事變之發動	四七
-----	-------	----

第二節	事態之發展與中央之因應	五四
-----	-------------	----

第三節	事變之和平解決	七〇
-----	---------	----

第四章	事變性質與和平解決之分析	九一
-----	--------------	----

第一節	性質之探討	九一
-----	-------	----

第二節	社會輿論之影響	一〇四
-----	---------	-----

第三節	軍事策反之運用	一一三
-----	---------	-----

第五章	結論	一三一
-----	----	-----

主要參考資料		一四一
--------	--	-----

緒論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強佔我國東北猶不滿足。次年（民國廿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又進攻上海，再一年（民國廿二年）三月開始進攻熱河和河北。接著進行分離華北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統治權之外的「自治運動」，華北岌岌可危，國難的嚴重性有增無已。①國民政府面對日本節節進逼的侵略行動，不能不謀求適當、有利而安全的對策之際；而國內五次圍剿中共，以及閩變的更迭發生，使國民政府陷於和戰兩難、進退失據的狀態。

國民政府諸領袖的決定是：攘外須先安內，統一始能禦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認為「此非對日作戰之時」，監察院長于右任亦電告張學良「中央以平定內亂爲第一」。②然而，朝野國人對「安內攘外」的先後問題、緩急問題，尙未達成一致的共識。

兩廣事變導因於黨爭，而其實力後盾是新形成的地方軍系。粵桂對中央的權力結構（特別是針對著蔣汪的合作），以及對日的政策，皆表不滿，對塘沽協定抨擊不遺餘力。同時，指責中央是借剿共之際乘機統一兩廣。③

兩廣軍政的自恃與割據，以及中央政府無法將其剷除與統一，是日後兩廣事變的基本因素。自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軍事分會」的存在以來，西南實際上已成半獨立狀態。蔣介石之所以容忍西南保持此半獨立的狀態，是對胡漢民「湯山事件」的隱忍與抱憾；以及對國民黨元老派採取敷衍態度，主要是為集中力量來對付共產黨，但他並沒有忘懷兩廣問題。④不料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間，胡漢民忽因腦溢血病故，致使兩廣事變發生了催化的作用。

兩廣事變是粵桂兩省以籲請中央「出兵北上抗日」而起。兩廣自認其動作是愛國行為而稱之為「六一運動」，反對者則認為「出兵抗日」乃軍國大事，應由中央統一指揮，豈可由一地區發動，徒增中央困擾。以愛國之名，行誤國之事；以抗日之名，行反蔣之實。故稱為「異動」、「事變」。

本文分為五章十二節記述之。撰寫之方式，有下列幾個要點：（一）依記事本末體行之。因為它是一事變，所以分遠因、近因以及事變的發動，進行不同層面的分析，陳述此一事變發生的原因。並徵之於史料，藉以校訂事變經過之時日，使讀者易於閱讀。（二）引用資料，均於附註說明出處。相同意見者并列并存，特殊者錄原文於註內。例如：紅軍之西走，據「朱德傳」所記稱：「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經過長時間籌劃，我們把各部隊的主要政治和軍事幹部召集到瑞金，通知撤退計劃。」⑤足見是有計劃的撤退。尤以當時負責與陳濟棠部聯繫協議者何長工之「難忘的歲月」一書中，披露了朱德致陳部黃延楨師長函，以及他們達成五項協議的要點。⑥（三）文中所有人物之稱謂，均以直書

其名爲主，避免用職銜、名號。如此中性記述，以示立足之公允。

至於資料使用方面，在國內文史資料的整理尙未能普遍邁入電腦資訊作業之前，基本資料的獲得不易。況且對此「爭論性」的史料，獲得尤難。本文使用了海峽兩岸當時的文獻、檔案、報刊、雜誌，以及重要關係人物的訪問記或回憶錄，時人著作、論文等。有系統地將此一事變加以整理、研判，始能順利完稿。

本文的目的有三：(一)正本清源，藉著不同層面的分析，陳述此一事變發生之原因，還於歷史的原貌。(二)性質探討，藉以了解兩廣是真抗日，或假抗日，其抗日是目的或是手段，以明其真象。(三)史實殷鑑，藉著中央對兩廣事變處理的態度與策略，以及兩者之間互動的關係，以突顯其原委。希望經由兩廣事變的研究，了解它在中國現代史上有何意義，提供國人對政爭的省思。

國家統一的完成，不外乎用戰爭與和平的方式；戰爭取決於武力，和平則取決於政治。和平統一是人人所祈望者，經由政治的協商，雖可免去血腥的殺戮，避免干戈於一時，但或許會影響於日後，遺害於後人。

國家應是統一的、整體性的，不是分裂的、個別的組合。任何政治人物，若心存私慾、割據爲王；則非個人之福，更爲國家之害。因爲任何的變動，輕則影響其個人一生的榮辱福禍，重則動搖國本，改寫歷史，焉能不慎戒乎？

附註

- ① 李雲漢 〈盧溝橋事變〉 頁一三一—一四
- ② 同上書 頁四二
- ③ 陳存恭 撰〈從「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探討「安內攘外」政策〉 錄於〈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 上冊 頁四三六—四五二
- ④ 劉斐 撰〈兩廣六一事變〉 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頁七一—一〇
- ⑤ 曹伯一 〈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 頁五五九—五六〇
- ⑥ 何長工 〈難忘的歲月〉 頁三二六—七

第一章 事變之遠因

第一節 廣州國民政府與中央之抗衡

民國十八、十九年，中國內部連年發生內戰，特別是在兩年中間，空前大規模的中原大戰，國家的元氣和國民生命財產的損傷都不計其數，給予外人一種分崩離析的印象。而民國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兩廣軍人在廣州自組「國民政府」與中央相抗衡，予人的感受尤為深刻。

兩廣與中央之對立，起因於民國二十年三月立法院院長胡漢民之辭職並被幽禁於湯山事件。①四月，胡漢民雖返南京私寓，而廣州之國民黨執監委非常會議，則藉黨中粵派諸元老之號召，與陳濟棠實力派之支持，於五月廿八日，自組政府與中央相抗衡。其外交部長陳友仁，於六月二十六日向日本駐廣州代理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要求日本援助反蔣運動。七月二十六日，陳友仁又到東京與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密談三次，謀以中國承認日本在我東北「既得權益」之條件，作為廣州國府委託

「泰平組合」購買日本武器之交換要求。②

九一八事變發生前，粵軍圖窺湘、贛，國軍準備討粵，皆是實情。但事變起後，陳友仁又面告日本廣州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倒蔣去張（學良）的主張是廣州國民政府和日本的一致立場。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也電告東京：在廣州的國民政府想藉九一八事變來倒蔣。取得政權以後當按孫中山先生在神戶演說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日本謀取諒解。自此以後，兩廣就開始標榜出「反蔣即抗日、抗日即反蔣」的論調。③

事變既起，蔣介石即令討粵部隊停止前進，又立即派遣陳銘樞、蔡元培、張繼携親筆函赴粵，勸粵中同志，取消粵府組織，一致對外。函內措詞，甚為懇摯，其略曰：

最近東北橫被侵略，師燬國蹙危亡無日。……環顧國內方激於意氣之爭，各走極端，悲哀曷極。當今同胞，涕泣相告，謂非舉國同心戮力，無以救亡。吾輩共負革命使命，有何不可犧牲？……弟當國三年，愆尤叢集，過去之是非曲直，弟願一人承之，惟願諸同志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爲中山黨徒只顧內爭，不恤國難。④

陳等三人持函離京時，蔣介石曾囑以三原則提示粵方：（一）如粵方自恃能應付國難責任，則全體來京改組國府，南京同仁無不相讓。（二）如粵方自付不能擔此重責，則粵府應即撤銷，粵中同志應即來京共赴國難。（三）如粵方意在合作，則南京尤爲歡迎，即請同志聯袂來京，面商參加政府辦法。九

月廿八日，陳等三人與汪精衛、孫科、李文範三人會於廣州，雙方當夜深談，擬定寧、粵合作基礎如后：

一、蔣介石引咎，通電聲明，俟統一政府成立，即行下野。

二、粵府亦通電引咎，聲明非統一無以救國，願即取消粵府，但不以蔣介石之下野為條件。

三、通電雙方同時發表，目下先彼此停止攻訐。

四、變更京滬衛戍組織，俾粵方同志安心來京，在總理陵前宣誓開會，議決統一政府辦法。

南京方面，最後議決一面照粵方希望，派陳銘樞率領十九路軍衛戍京滬。一面電催粵中首要，早日北上，電文並有「諸公朝到，下野通電，即可夕發」之語。於是粵方派出代表五人，聲明俟胡漢民離京抵滬，即當啓程。⑤當時之所以有如此之結果，乃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人心悲憤，呼籲團結禦侮，共赴國難，這使寧粵雙方當事人的心理，皆受極大刺激，因而消散了內爭的熱情，彼此都有相忍為國的感情，祇要面子下得去，即願休手的。⑥

十月二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致電中國國民黨監察委員張繼等說：「中國祇有一個政府，統一中國方能對外、救國。故於此黨國存亡之際，不得不在事理上求一圓滿解決之道。」⑦六日，大公報以「望軍政各方大覺悟」社論一文，籲請捐棄成見，戮力為國。⑧十四日，國民政府委員兼立法院院長胡漢民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十五日，胡漢民致電在廣州的中國國民黨黨政各負責人說：

現在外患急迫，不弱於甲午，而國內不調整之現象，則爲甲午所未有，其所以致此由，在於過去黨內糾紛迭乘，政治舉措失當。人每欲挾黨內一部分力量爲己有，黨即失其團結之本體；人每欲自私，即互相排他，排他則糾紛愈多，而各人遂忙於對人，忽於對事。……黨不爲人民所重，乃爲人民所輕，積漸且爲人民所忌恨矣！政治之不易澄清，紀綱之不易整肅，胥坐此故。……今日正爲吾黨同志徹底覺悟，力圖團結之急要時機。蓋非各自覺悟以改正已往之誤失，即無以求黨內之團結，非黨內之堅固，更無以集中全國之力量以對外。……⑨

廣州方面接到胡漢民來電後，對和議自然不能不贊成，即推舉汪兆銘、孫科、鄧澤如、古應芬、李文範爲五人代表與南京五人代表李石曾、蔡元培、陳銘樞、張繼、張靜江於上海舉行會議。⑩會議自十月廿七日起至十一月七日，經過七次會議之討論，得到幾項協定：(一)寧粵雙方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分別在京、粵召開，新選的中央執監委員，比例分配名額，併爲一起。(二)國府主席不以軍人充任，推選黨內年高有德的文人任之。(三)革命軍總司令一職撤銷，改爲委員制。⑪

南京四全大會於十一月十四日至廿三日期間召開。十九日第五次會中，蔣介石表示兩事：(一)選舉四中執監委員，儘量接受粵方名單。(二)個人決心北上，竭其智能，效命黨國。會中報以熱烈之同情，授以北上禦侮之責任。廣州四全大會於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七日期間召開，會中孫科携回上海會議之決議案向大會報告，不料大會全體代表以未能實現蔣介石宣佈下野之先決條件而加以拒絕

。迫使孫科當場退席，引起內鬨。而汪兆銘在上海發表談話，認為蔣不先行下野，是顧全事實。爲此寧、粵之爭竟轉爲汪、粵之爭。粵會閉幕前兩日，胡漢民等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⑫

蔣介石於十二月十五日辭職回籍，一中全會於是月廿一日在南京召開。林森當選爲主席，孫科當選爲行政院長，蔣介石、汪兆銘、胡漢民三人當選中執委常務委員，輪流任主席。蔣、胡之間，既有如此不能共處之氣氛，胡汪之間，又有舊嫌新怨之併合。於是蔣下野在籍，胡稱病在粵，汪稱病在滬。新政府名爲統一，實缺中心。廣州非常會議，雖於取消粵府宣言中，有黨權統一於中央，治權奉還於統一政府之隄句，但同宣言中，又謂遵照四大大會決議，在廣州設置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與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兩個機構。^⑬主持粵、桂兩省軍政，處於半獨立狀態，達五年之久，此乃種下日後兩廣事變之根由。

第二節 兩廣對中央政策的態度

民國二十年五月，當國軍對中共蘇區展開第二次圍剿之際，部份黨人（以粵桂籍爲多）因不滿胡漢民被幽禁湯山事件，集會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在黨、政兩方面與中央對抗，而在軍事上，粵桂軍合作對中央異動。此等情形導因於黨爭，而其實力後盾是新形成的地方軍系。

兩廣的地方軍系，他們攻訐中央政策及領導階層，呼籲其他有力軍人響應。^⑭此時的中國軍隊是許多大小軍事領袖所組合的，他們的行動不受最高政治領導人或領導機關的指揮。這時期中國沒有統一的軍隊，沒有統一的指揮系統，也沒有統一的軍隊管理系統，^⑮誠如陳志讓教授所言是「軍紳政權」。這些地方將領，他們最關切本身的安全問題，他們無力獨抗紅軍，需要中央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但又難免懷有被中央乘機兼併的疑懼。

十九路軍進入福建後逐漸與中央疏離，塘沽協定後，鄒魯等以為將不抗日，極力反蔣，活動福建加入西南團體，此時形成中央與西南的緊張狀態，然而粵軍兩大系統的首領——陳濟棠與陳銘樞之間又有難以解開的結，終於分道揚鑣，十九路軍鋌而走險，釀成閩變。西南以其叛黨叛國，予以聲討。陳濟棠曾派遣陳維遠入福建，有接收之意，陳維遠雖是十九路軍舊人，但因資望不足，未見實效。民國廿三年一月十六日，陳濟棠乃致電蔣介石先生表示：「請保留十九路軍名稱，劃閩南為該軍防地，由戴戟、陳維遠予以收編。」^⑯至於廣西則較同情謀叛分子，亦收容十九路軍一個團。」由此可見，兩廣雖反對福建之作爲，但亦無支持中央之誠意。

閩變平定後，國軍得再以全力繼續向贛南進剿。國軍所使用之碉堡戰術，原為針對共軍所慣用之運動戰而設計的，經過三個月來實際運用，碉堡戰術確實已收到預期效果。四月十一日至廿八日，歷時十七天，大小二十餘戰的廣昌會戰。是中共生死存亡之戰，結果證明了「陣地戰」實在不是